

罗荣桓入党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 卫惠笈



1926年6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他和张沈川一道由青岛乘货轮南下。临行之前，一位在五卅运动中结识的姓柳的朋友建议他们先到上海去找当时上海学联负责人、上海大学附中主任侯绍裘，再请侯介绍他们去广州。

罗荣桓、张沈川到上海找到侯绍裘。侯在了解了他们在青岛参加爱国反帝斗争的情况以后，对他们说：“现在黄埔军校正在招生。如果你们要上黄埔，我写封介绍信就可以。按你们的情况，可以不用考试。”

这时，罗荣桓、张沈川并不了解这位看来十分文静的侯先生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更不晓得他就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而他们当时还是想读书，并没有从军的思想准备。罗荣桓又感到自己是深度近视眼，从军也不一定合适。他同张沈川商量了一下，婉言谢绝了侯绍裘的好意，仍然准备去投考中山大学本科。

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后，罗荣桓等继续乘轮南下。一路上，罗荣桓和张沈川经常登上甲板，倚着栏杆，眺望祖国的辽阔海疆。他们回顾了这两年多走过的路程：长沙、北京、青岛、上海，现在轮船正乘风破浪向南航行……他们在中国东部绕了一个大圈，如今终于奔向向往已久的革命策源地，心情又怎能不激动呢？

7月间的一天，货轮由辽阔的伶仃洋进入虎门，只见环绕虎门要塞的一道白粉墙上，书写着异常醒目的10个大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见到这一巨大的标语，旅客们的精神都为之一振。罗荣桓、张沈川听旅客说，这里就是林则徐销烟处。他们回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凌辱，人民所遭受的

灾难，抚今思昔，深深感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时代已经来临了，革命正在向他们招手。

罗荣桓到达广州，正是北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很快攻克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7月12日攻克长沙……

罗荣桓、张沈川刚放下行李，就兴奋地走上街头，他们想尽快地领略这革命策源地的风采。在几条热闹的大街上，他们看到两旁高楼矗立，在商店的橱窗里、电线杆和支撑廊檐的水泥柱上，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列强！”“打倒吴佩孚！”“打倒孙传芳！”“工农兵联合起来！”有的地方还搭了庆祝北伐胜利的松枝牌楼。“号外”“捷报”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在马路不时可以看到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的国民革命军队伍。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热气腾腾的景象，同张宗昌血腥统治下的死气沉沉的青岛形成鲜明对照。

罗荣桓和张沈川兴冲冲地走进书店，买了不少宣传土地问题的报刊、小册子，从书店出来，罗荣桓双手捧着一大摞书，高兴地连声对张沈川说：“好啊！这下可好了！”在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两只眸子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一回到旅馆，罗荣桓顾不上复习功课，如饥似渴地阅读买来的书籍。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罗荣桓跑了多少地方，又试验过多少办法啊！到了广州，他终于找到了！他看到了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工农大众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无比威力。他兴奋地对张沈川说：“现在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土豪劣绅就是把中国搞得国弱民穷的恶势力。要打倒恶势力，必须以俄国为师，把广大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而唯有共产党才能担当此任。”他和张沈川相约，要勇敢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荣桓在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认识到北伐需要大量青年从军，他虽然因为自己是近视眼，不宜投考黄埔，却多次写信给他弟弟罗湘和“土梦学友联合会”的同学们，招呼他们到广州来，投考黄埔军校，报效革命。罗荣桓报考中山大学，因为第二外国语德语——不及格，未被录取。张沈川考上了中山大学文科。罗荣桓仍然留在广州，一面等罗湘来，一面多看点革命书籍，思考一些问题。他常到中山大学去。当时，张沈川与许多共产党员关系密切，罗荣桓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对革命形势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10月，罗湘和十几位同学从湖南来到广州，罗荣桓帮他们办理了进黄埔军校的

报名、考试手续。当罗湘即将入学的时候，罗荣桓鉴于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日趋尖锐，再三嘱咐罗湘，在参加政治运动时，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称是“总理信徒”的右派的当。

把罗湘送进黄埔军校后不久，罗荣桓返回故乡。这时，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正迅猛发展。衡山又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份，农民协会已普及到全县大部分地区。罗荣桓感到世道确实不同了，昔日的泥脚巴子已经挺起了胸膛，扬眉吐气；而那些绅士们却像经霜的秋叶，蔫蔫地低下脑壳。

罗荣桓一回到家，街坊四邻纷纷前来看望，向他打听北伐的情况。一些农会积极分子又邀请他参加农会工作，罗荣桓欣然从命，随即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中去。他总是笑眯眯地认真听取乡亲们们的意见，帮他们拿主意。他还受农友的委托，到县城找到县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汇报南湾的情况，受领指示。

不久，衡山梦学九区农民协会在南湾罗氏定德祠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后进行了庆祝游行。接着，农会又委托罗荣桓发动和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开展了为支援北伐进行募捐、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脚、剪发等活动。有一次，土豪劣绅罗凤梧唆使打手打死向他募捐的一名儿童团员，罗荣桓领导群众对他进行了坚决斗争，打开了罗凤梧的谷仓和钱柜，将罗凤梧的谷子和钱，一部分作为被打死的儿童团员的抚恤金，一部分分给了贫苦农民。

1927年1月，湖南各地纷纷开展镇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农民运动达到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有利的形势下，南湾地区的群众觉悟普遍提高，农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进一步巩固。高涨的革命形势使罗荣桓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4月上旬，罗荣桓收到彭明晶的来信。信中说，他参加了北伐宣传队，已随北伐军由广州来到武昌，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建议罗荣桓也到武昌来读书。彭明晶这封信不禁使罗荣桓怦然心动，这时，他与父兄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罗国理知道罗凤梧等人的势力依然存在，罗荣桓把他们得罪了，将来他们定会报复。他常常骂儿子忤逆不孝，急于把他赶走，罗荣

桓在这个家里是再也待不下去了。而他此时对上大学的夙愿也未能完全忘怀。于是，4月14日他动身去武汉。

这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但土豪劣绅已经蠢蠢欲动，罗荣桓常常处于地主分子罗凤梧的监视之中。为避免意外，他在这一天夜里，由一名农会积极分子老肖护送，秘密出发。他和老肖顺着崎岖的小路，登上了南湾西面的金尖峰。这时，明月仍然悬挂在西天。罗荣桓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深情地凝视着哺育了他的山河大地。南湾一带的屋宇、田野、林木、河流却仍然沉浸在朦胧的夜色之中，他投下了对家乡的最后瞥。从此，他南征北战，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却再也没有回过南湾。

罗荣桓到达武汉后，通过补考，插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一年级读书。当时已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大革命处于危险之中。在武汉的政治舞台上，乌云翻滚，眼看着一场摧残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革命队伍中的许多不坚定分子被蒋介石的屠刀和武汉险象环生的局面所吓倒，纷纷脱离了革命。

就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罗荣桓却像海燕一样，展开了翅膀。到了武汉以后，他经彭明晶介绍，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担任了武昌中大支部的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共党员。7月初，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他把心爱的教科书、英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心愿，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对吃苦、牺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临行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照顾颜月娥母女的生活。如果颜月娥改嫁了，就帮助他把她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颜月娥的，他告诉颜月娥，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颜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罗荣桓考虑到颜月娥的处境，又补充了几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已作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信寄了出去，罗荣桓割断了同家庭的关系。他将几天后出发，奔向新的战斗岗位。

（摘自1999年第9期《支部建设》，原标题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罗荣桓要亲自经受一番革命风雨的洗礼》）

在一次摆脱敌人袭击的撤退中，我亲眼看到两个同志搀扶着一名战友撤退，被搀扶的同志一边跑一边撕裤子往嘴里塞，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怕密码本落到敌人手里，所以才用这种方式保护机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这个“吃”本子的人就是电台侦察工作创始人之一蔡威同志。正是他带领电台的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破译敌军密码方面屡建奇功。而在长征即将胜利之时，他却因为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29岁。徐向前元帅曾高度评价赞扬他鞠躬尽瘁的一生，誉之为“无名英雄”。

在长征途中，我边行军边跟着班长学识字、学文化，由于好学，我进步很快。后来，组织上送我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学习无线电技术。当时，工作条件非常简陋，但是，没有条件我们就创造条件，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由于物资匮乏，电台用的电池很稀缺，我们就把用完报废的旧电池的锌皮扒了，再装上一些盐，放进一个桶里用盐水泡上，早晨泡上，晚上就可以重新用一阵子。在没有汽油、柴油的情况下，我们用提炼猪油、牛油的办法，让发电机运转起来。

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被敌人埋伏袭击，当时我脖子上挂了两块干电池，我摔倒在三四米深的土沟里，这两块电池不见了，黑暗中我到处摸索寻找电池，摸到了摔下去的牲口，掉下去的粮食、器材等，但除了电池，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我知道电池是我的武器，是我的生命，一定得摸到它，后来我终于找回了电池。

1936年至1937年，我跟随西路军打到新疆。1938年初，从新疆回到

延安，并由前线调到后方的军委二局工作。开始一段时间，我很不适应，老想上前线参加战斗，就找到二局局长，请求他把我调回前线。局长说：“前线需要人，后方同样需要人。你是共产党员吧？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我一听，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在新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干了一辈子。此后，我随军委二局参加过多次战役，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在第一条线，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正是有了对党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品格，我们每次都能在关键时刻破译出重要情报，发挥关键作用。在电台侦察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苦练技术、提高本领，才能技高一筹、战胜敌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日夜监控敌台，掌握了敌方联络的波长、时间、声音和手法，即使敌人把波长换了，我们也能迅速知道他们是谁个报务员发的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军委想要得到哪儿的情报，我们就想尽办法截获哪儿的情报。

1941年，我和另外两名同志临时承担一项破解敌军行动部署和作战方案的重大任务。当时敌台离我们很远，声音小、干扰大，侦收条件相当恶劣。我们就自己改装机器，架设天线，最终成功截获了多份十分重要的情报，为赢得战争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9年初，我们部队正准备攻打驻扎在天津的国民党军队，一天值班时，我突然听到敌军一个电台里说：“共军司令部驻在杨柳青，房顶上放了一块镜子，明天一早去轰炸。”我们觉得这个情报十分重要，就对这个电台进行分析研究，确认这是敌人的一个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到了沙洲坝，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毛泽东发现沙洲坝百姓都是喝附近泥塘里布满细菌的黄泥水。经过走访调查后，他弄清楚了沙洲坝百姓即使天再干旱也不打水井的原因：一是因为打水并花费大，贫苦群众打不起；二是因为千百年来，当地传说沙洲坝地底下有条“旱龙”，动不得。弄清楚问题的症结后，他破除迷信，立即亲自指导军民打了口直径85厘米、深约6米的水井，让沙洲坝的贫困百姓自此喝上了甘甜清水。

当地百姓十分感激。因为并非是红军来了以后毛泽东亲手挖的，所以乡亲们深情地给这口井起名为“红井”。可见在当年中央苏区，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为民谋利上，起到了模范引领作用。

（摘自2017年第14期《群众》，原标题为《一首山歌唱出“苏区干部好作风”》）

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关于党旗的正式决定

□ 陈小梅

1927年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第十四号通告：最近工作纲领》，明确指出：“要坚决勇敢地树立工农革命的大旗……建立工农政权。”“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

标志。”这是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作出关于党的旗帜的正式决定，虽然《通告》中对党旗的制作并无具体规范，但“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的中共党旗图案式样，基本框定了党旗的轮廓和构成要素。

（摘自2013年第7期《中国档案》，原标题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旗式样》）

潜伏台，平时深藏不露，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对外联络。我们马上向上级报告，当晚前指司令部就撤离了驻地。第二天，敌机果然把那个小村炸成了一片废墟，而我们却没有一人伤亡。

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在军委三部工作，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役，负责信息收集工作。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前指决策指挥提供了全面、及时、准确的情报。庆功会上，前指司令员邓华高度评价我们的工作，他说：“解放海南岛，你们立了头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多次高度评价电台侦察工作，称有了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战斗胜利后，我深感自己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文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对知识的渴求十分迫切，经常是一边完成领导布置的工作任务，一边加班加点学习文化知识，后来我考入解放军政治学院上了三年学。

1984年离休后，我一直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每天读书看报，及时倾听党的声音，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我的读书笔记和剪报加起来有十几大本，有半个多人高。近些年，我利用闲暇时间，经常到部队、学校给年轻官兵和学生讲革命传统，用我长征的那段艰苦岁月的经历，教导年轻人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作贡献。

现在，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军队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党的宗旨都永远不能忘，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色永远不能丢。希望年轻一代不断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走好新的长征路。（祝建伟 整理）

（摘自2019年第4期《党建》）

让我信念永驻
亲历长征，

□ 胡正先

忆往事



胡正先，原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副兵团级。参加过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1984年4月离休。

我今年102岁了，是一个有着81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从12岁参加红军起，我跟着党走就是一辈子。参加红军，亲历长征，这些都是我一辈子的光荣和宝贵财富，让我信念永驻。可以说，我这一生是跟党走的一生，也是奋斗的一生，幸福的一生！

1918年9月，我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石板冲乡。小时候家里很穷，当过放牛娃。12岁那年，一支红军部队在我家乡活动，受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影响，我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